

西夏法制

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地位

□ 余钊飞



西夏王陵出土瓷器中的白胎透明釉瓷器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后也相继颁布过《麟趾格》和《大统式》；鲜卑化的北齐王朝更是制定过享誉后世的《北齐律》。辽国的《咸雍重修条制》、金国的《泰和律义》分别是契丹和女真政权的典型立法成就。这些历史表明，鲜卑、党项、契丹、女真等民族为中华法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同样，唐朝的“律令格式”法律体系也对后世辽夏金等政权影响至深。

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法制中，西夏法制占据独特地位，以《天盛律令》为代表的西夏法典也是中华法系的经典之作。中国法制史不能没有西夏法制史，中国文明史也不能没有党项人所创造的西夏文明。西夏法制充分展示了党项文明和中原文明的高度融合，开创了朝气蓬勃的西夏文明，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明特征。

西夏文明有其独特的历史，由于蒙元灭夏后独不修西夏史，西夏又地处西北，该地区文明在政权被灭后与中原文明少有交流，以致西夏文明在后世湮灭无闻，被淹没在大漠之中。直到近代，学者才相继揭开了神秘的西夏历史的面纱。特别是1908年沙俄探险者科兹洛夫打开了黑水城这座巨大的西夏文化宝库，大量的西夏珍贵典籍被送至俄国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随着大量学者对黑水城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西夏时期的律法才开始展示在世人面前，《天盛律令》《贞观玉镜统》等西夏法律相继面世，弥补了中国法制史的重大历史空白。

西夏法制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构成的多元法制。西夏以宁夏平原为统治核心，建成著名的兴庆府，融合党项族、汉族、吐蕃、回鹘等各民族共居的多民族城市，以此为基地向河套平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拓展国土，构成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和居住的西夏国。在西夏境内，党项族居主体，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优势；汉族人数较多，在经济、文化活动方面占有优势；吐蕃、回鹘较弱，但在宗教、牧业上特色鲜明。多民族共同融合的西夏王朝采取类似于唐朝的力主包容的民族政策。这一点与蒙元政权的人分四等有着显著的差异，充分体现了西夏王朝的包容性。西夏法典规定，与沿边异国番番、回鹘、鞑靼、女真要“相和倚持”。西夏时期与境外各民族的交流，使西夏经济、文化呈现出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融汇、共同发展的局面，使主体民族党项族在生产、生活上逐渐出现了汉化倾向。

党项人是极其善于学习的民族，除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西夏文的创建，也迅速地向中原王朝学习并创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李元昊开创西夏王朝后，改元“天授礼法延祚”，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他“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以此开创王朝基业。在西夏第五位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王朝进入鼎盛，制定了著名的《天盛律令》。犹如高洋制定的《北齐律》，《天盛律令》的制定汇聚了当时西夏最为重要的大臣和律学专家。李仁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追缅先祖之丰功；弘扬

丕模之遗德，谨尊古训，欲改大法，为民取则，为世除恶”而开启《天盛律令》的制定工作，任命西夏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启动立法，汇聚10多名“中书”“枢密”等机构的王公大臣和“汉太学院博士”“汉文博士”“蕃太学院教授”的博学鸿儒组成律令编纂班子。皇帝亲自主导、王公大臣和律学大家汇聚的编纂团队按照“参照诸新旧律典，勘订种种不明、不妥、不适之处”的指导方针，在1150年完成了著名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即《天盛律令》。

以《天盛律令》为代表的西夏法典吸纳了《唐律》《宋刑统》立法精髓并有所创新。在立法体例上，《天盛律令》在唐宋律的基础上有重大突破。宋承唐制，但宋朝“以敕破律”的情况非常突出，导致敕条与法律、敕条与敕条之间章法混乱。《天盛律令》则在形式上使用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没有条外的令、格、式、敕，并开创了分层次书写的条款形式；把皇帝的旨意和各种法律条文都统一到律令当中，保持法律条文的完备严谨，减少断案的任意性，超越了宋朝“以敕破律”的立法水准，在体例上对唐宋律有了重大创新。此外，在内容上，《天盛律令》内涵极其丰富，涉及刑事法、属牧法、军事法、婚姻法、宗教法、民族习惯法、民间契约、诉讼审判制度、亲属法律制度，全面贯彻了儒家“明德慎罚”的治国思想和维护“君权、父权、夫权”的宗法伦理思想；有别于中原王朝过分突出“男尊女卑”的情况，党项人的女性地位相对较高，这在国家政治中体现得十分突出，多位太后、皇后主导过西夏政治。同时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具备较高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在婚姻和财产处分自主权上远在固守“纲常伦理”的宋朝之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性自我主导和权利实现，非常难能可贵。此外，西夏在辽宋金等大国夹缝中生存，“以武立国、全民皆兵”的军事法制完备，党项人尚武精神得到充分体现，著名的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就充分展示了西夏军事立法上的卓越水平。



世界的近代化巨变

从世界历史的长河看，清代与历代王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不断地面对西方近代化的挑战。清代兴起的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兴未艾，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清代灭亡的20世纪初叶，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不断融入世界。从此意义上讲，一部清代历史，尤其是晚清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历尽曲折、艰险和苦难，不断走向近代化、走向新生的历史。

在17世纪中叶，当清代统治者挥戈入关、饮马长江，完成统一大业之时，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这不过是王朝更替的故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没有意识到200年后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略的狂风暴雨会惊涛拍岸，并冲决封建帝国的大堤。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爆发式地加速前进。在清军入关的1644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一个半世纪，航海业和通信工具的渐趋发达，使人类跨越高山重洋，打破相互隔绝，从而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当人类进入18世纪后，历史的进程更是改变了迂缓缓慢的步伐而急剧前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大跨越，使传统社会大踏步地快速跨进近代社会的门槛。在这期间，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经历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历经独立战争而诞生。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快速告别了农业社会，迎来了工业化和近代化，震撼和改变了整个世界，从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伟大转折点。

近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深远、最伟大的变革，人类仿佛一下子得到了

走上曲折艰难的近代化道路——清王朝的兴衰史鉴（五）

□ 顾 春

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喷涌而出，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地增加。近代化犹如大海中的潮汐，往复推滚，永不停息，它席卷一切、带动一切、冲击一切，力量非常巨大，成果极其明显。18世纪以来的西方近代化浪潮激荡全球，缩小了不同国家、民族的地理距离，摆脱了古代世界中的彼此隔离而进入世界历史的漩涡，它使历史真正地变成了世界史。

中国在世界洪流中的应对和变革

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如沙漠中的小块绿洲，萌蘖初生，潜滋暗长。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近代化，受到了强大的封建制度、传统势力的打击和压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如雪上之霜，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这种极为复杂而特殊的环境下迈出了艰难步伐。西方的近代化是通过工商业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形成和产业革命的推动来实现的，而中国的近代化却是在中国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清朝统治内外交困、陷入巨大政治危机的形势下，由统治阶级通

过新政的形式组织和推动的。鸦片战争后，清廷先后遭受了三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三次打击所带来的影响之深、变化之巨都是空前的：农民起义和英法列强的坚船利炮，催生了洋务运动；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催产了戊戌变法，而《辛丑条约》的城下之盟，则诞生了辛亥革命，中国从此一步步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之时，为“剿发捻”和“勤远略”，清朝统治者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扛起改革旗帜、开启洋务新政步伐。在奕訢、文祥等朝廷大僚和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吏的推动、组织下，洋务新政以自强求富为号召，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起点，继之以民用工业并渐次展开：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外交和洋务新政。以“官办”的方式创建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等19个近代军事工厂，为陆海两军生产军火和舰船。以“官督商办”等方式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汉阳铁厂等20余家民用工业，涉及航运铁路、煤铁开采、机器纺

织、电报电讯等许多领域。创办京师同文馆和各类军事学堂等新式学校并选派留学，培养人才以供新政遣用。新式海军更是从无到有，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北洋水师共有舰船105只且技术先进、实力较强，规模位居世界第六、远东第一，是洋务新政的最集中代表，一如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被清廷认为是洋务新政的最大成果。

就在朝野上下普遍认为30余年的洋务新政成果丰硕，同光中兴富国强兵之际，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使北洋水师毁于一击，更彻底粉碎了清廷虚幻的复兴之梦。泱泱中华惨败于“化外小邦”和割让台湾、赔偿白银2亿两的奇耻剧痛，使朝野上下受到极大震动和极大刺激，引发了深刻的思想解放，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强烈要求“大变、全变、聚变”的改革洪流。于是，在1895年春，以康有为的万言书和其领衔的数百举人“公车上书”为标志，维新变法序幕由此拉开。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积极鼓吹救亡、变法的推动下，经过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各种学会、报刊的思想、舆论酝酿，维新变法终于迎来了它的高潮——戊戌变法。1898年6月，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全面推行新政改革。在政治上，广开士民言

路，鼓励保荐人才，调整裁撤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在经济上，设立商务局、农工商部等机构，支持兴办近代企业，整顿厘金弊政，保护商业发展，奖励发明创造。在军事上，裁汰老弱，整顿改革八旗、营勇，扩充海军、筹办团练。在文教上，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倡西学。戊戌变法的快速全面推进，深深触动顽固官僚的切身利益和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快速激化了帝后矛盾，使这场持续103天的改革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宣告失败。暴风骤雨般的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政治改革的闸门，成为之后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大潮先声。

伴随着灾难深重的庚子事变，中国进入了20世纪。这个极为惨痛的世纪开端，标志着中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不断的王权沦丧、国土割让、巨额赔款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深刻觉醒，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以拯救危亡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呼声。

伴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觉醒，在清朝专制政府之外，主张尊君重民的立宪派和主张推翻清廷的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影响历史发展

终要由人民来评价，人民是我们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最终评判者。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在2016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在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总结经验、完善思路、突出重点，提高改革整体效能，扩大改革受益面，发挥好改革先导性作用，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这些重要论述既指明了新时代改革的方向，也提供了新时代更为完善的改革评价标准。特别是获得感作为一个评判标准的提出尤其具有针对性。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对实实在在“得到”的一种强调，这一新标准的提出超越了以往主要从经济方面评判改革成效的思维，体现了发展与公平的统一，突出了评判改革的人民评价尺度，表明我们对改革发展最终目的和意义认识的深化，对各级党员干部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确实，尽管改革的评价标准众多，但所有方面的改革绩效最终必须落实到人民的实际利益满足与实际感受上才是合理的，因为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正如《纲要》强调的：“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正是基于人民的评价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工作持续发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成就举世瞩目；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

努力增进人民福祉

人民至上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要不断满足人民需要，努力增进人民福祉，努力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饱含深情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的改革形势下，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正当利益需求是以公民权利的形式予以体现的，必须要通过法治予以保障。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障公民权利。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相应地，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则必须树立法治思维与公民权利思维，学会用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促进发展，保障人民权益。也正正是着眼于更好实现人民的发展幸福，党的十九大报告才做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所以我们要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确立人民评价标准

人民至上意味着改革发展的成效最

进程的重要政治力量，推动着新世纪的历史车轮不断加快前进的步伐。为维持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慈禧不得不在1901年重新举起新政的旗帜，实施其血腥镇压的戊戌变法的大部主张。1905年之后，内外交困的清廷以预备立宪为主旨，陆续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并曾在前期给立宪带来巨大政治希望，但清廷的虚以立宪、实则专制，使立宪派从失望到绝望直至最终走向革命。

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自19世纪末即矢志革命，先后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深刻揭露了清廷压迫人民、丧权卖国的极端腐朽本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活动和武装起义，付出了巨大牺牲。革命派以掀翻天地的斗争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不断宣传革命、发动革命，革命形势渐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终于迎来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胜利。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2月12日，清廷发布清帝退位诏书，宣告长达268年的清王朝的终结和辛亥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军事近代化、经济近代化走向政治近代化和全面近代化，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辛亥革命的胜利，彻底终结了封建帝制，中华民族从此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